

以美学为例， 反思西方在中国的影响

西方的现代化给世界打上的烙印几乎遍及我们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产生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这一现象对人类最终是福是祸，这个问题尚待人们去评说。不管怎么说，鉴于西方技术和自然科学的优势，认为西方的人文学科——至少在其理论创建和反思程度上——同样具有范式意义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自萨伊德提出“东方主义”这一观点后，那种以西方为标准的观念受到了质疑。这体现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其他文化圈有意识地加以关注这两个方面。然而这种“后殖民批评”收效甚微。我们西方人仍然陶醉在自己的学术理论中，认为其他民族和文化在以人的本质作为最终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领域理所当然也得沿用西方的话语。其结果是西方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在人文学科方面的交流始终单向进行。欧美的理论、范畴和模式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从者甚众。反之，我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研究仅限于某种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罗列，只是探寻其特异之处（说重一些就是猎奇），将其作成卡片，分类归档，搁置于我们的科学大厦了事。

在这种单行道式的人文学科交流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本世

纪 20 年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理论在中国起主导作用。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最先进的西方社会学说确定为正式的指导思想。如今,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告别了马克思,似乎只是名义上还在坚持这位特里尔名人的学说;近来又出现了某种推崇本国文化传统的倾向。

现代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碰撞的历史,其中包括中国现代美学。人们每每提出这样的异议,认为至少中国古代未曾有过类似的西方美学的学科。当然,从注重方法的理论角度来看,此类意见不无道理。但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美学中艺术哲学方面的相似性,中国人将前人对文学艺术本质的反思理解为“美学”,这些反思更多地是富有诗意而不是有系统的。如果我们不想进一步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那么我们就应该肯定这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近,尽管这里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中,由于两种原因使得美学具有特殊地位。首先,美学,至少在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美学时,形成了一个非政治性的空间。相对而言,美学在自由探讨西方思维方式时有较多的余地。其次,从中国备受重视的艺术哲学角度来看,美学所属的领域有着许多与本国传统相通之处。与中国传统社会学说(主要是儒家学说)不同的是,这个领域中的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没有受贬抑。相反,本世纪初中国人面对西方开始为自己定位时,把本国文化视作一种美学文化。中国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刘纲纪和李泽厚在其合著的《中国美学史》中指出,中国古代美学的末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特征乃是“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接触西方美学,主要是德国美学,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足够

的机遇,一方面认识令人神往的陌生的东西(如悲剧范畴和黑格尔体系等),另一方面寻求熟悉的范围,用以反观本国与西方相近的传统。“五四”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长期致力于此的。他对中国人形成上述文化和美学的自我理解影响甚巨。蔡元培曾在德国学习过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他认为,西方人主要受宗教的影响,而在中国,美学作为道德、礼仪和艺术的综合体与宗教在西方的作用相似。因此,他提倡在现代中国“以美育代宗教”。他的理论至今仍具有影响。这体现在中国正努力在学校重新推进美学教育。而在蔡元培所处的时代,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是在与德国传统美学碰撞中形成的。鉴于翻译和接受的困难,德国传统美学——从唯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推迟了 100 至 150 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带有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范畴和命题的印记,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这个倾向越加明显。中国人把“aesthetics”译为“美学”,也应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这个译法颇成问题。在中国传统中,只有早期儒家典籍中有过“美”“善”互用的例子——这使人联想到柏拉图,除此之外,无论是在自然美还是在艺术美的形式中,美的范畴都是无足轻重的。非但如此,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中,“美”作为愉悦感官的外在形式,带有一定的贬义,甚至有“俗”的味道。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和谐”、“自然”等属性。艺术作品不在于模仿自然,而在于它具有诗意,具有含蓄性,意在言外,使人感受到自然的造化。

现代中国美学家致力于在本国传统中寻找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颇似迷向的航行。不过,这样的历险往往使他们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活法”(吕本中)与康德“自然法则”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前面提及的美育在德国和中国相近的地

位。另外，中国人在自己文化背景下对马克思的美学理论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讨。若这样的探讨反馈到马克思的故乡，也是会有启发性的。也许，最重要的是互相开始对话。

对话当然不是一方提出看法，另一方以小学生身份洗耳恭听。只有其中一方也能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受到重视时，才能形成对话。西方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这样的对话看来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基本前提是通过翻译了解对方的立场并加以研究。西方对中国的翻译研究还远不能令人满意。不过，1992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德译本出版，我们至少有了一部古代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1995年布洛克尔(Gene Blocker)和朱理元合编了英文版的《当代中国美学》文集，勾勒出中国现代美学的概貌。最近，刘纲纪的《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译成德文，在《特里尔大学学报》10号特刊上发表。李泽厚、刘纲纪的德译本，前者讲中国古代美学，后者讲中国现代美学(当然后者侧重中国对德国美学的借鉴和接受)，为德语读者提供了完整的中国美学史。

中国在与西方关系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处在师从的地位，从而造就了这样一类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精通本国的传统，而且十分熟悉西方的理论。因此在近百年里中国产生引人注目的东西合璧的思维方式，美学仅是其中之一端。中国在接受佛教过程中已经证明具有吸收外国文化思想并进行加工、最终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的能力(如创立禅宗)。目前，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关键是打破旧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熟悉两个世界，这将会是一大长处。

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一方面，我们的理论创建已经到了如此庞杂的地步，以至除了专家外，几乎无人问津这些超脱实际的学说；另一方面，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时髦理论影响下，当我们寻

求知识和意义时，“什么都行”似乎成了最高智慧。时下的范式就叫“随意性”。但是，由于东亚有一种新的文化自我意识在逐渐形成，我们可以期待，这种范式将越来越受到质疑，此类后现代理论将受到挑战。发现文化上的他者同样也会对我们西方人文学科产生富有活力的影响，套用伽达默的话来说，他者——此处指的是对人类生存问题有着不同解答的其他文化——对我们西方也会有所启示。二十一世纪的新范式将会是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

鉴于这一发展趋向，汉学将被赋予重要的任务。到目前为止，西方汉学或多或少有点装饰性的“兰花专业”的味道，不太受重视。它从事的研究也大抵限于文化科学与史学等“边缘性”题目，其研究结果常常被汉学以外的学者所忽略。西方汉学即使对中国有影响，也远不及西方其他学科。现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范式，情况将大为改观。基于汉学家了解中国文化并谙熟欧洲人文思想传统，西方汉学将扮演文化之间的“翻译者”，来沟通中国和西方这两个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沟通不再是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以西方的方法整理中国的材料；沟通也不再是单纯的“输出”、“输入”，而更多的是共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文化沟通地带的汉学家，不再是“二道贩子”，而是在从事第一产业。作为文化学者，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自己的领域由点缀性的边缘改变为思想的前沿。

(肖金龙译)